

张岱年

作品

人生的意义，即是人生在宇宙历程中之位置。
欲知人生意义，当将人生作为一自然事实而观之。

心灵与境界

张岱年 著

红旗出版社

人生之意义，即是人生在宇宙历程中之位置。
欲知人生意义，当将人生作为一自然事实而观之。

心灵与境界

张岱年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与境界 / 张岱年著 .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051-3502-4

I . ①心… II . ①张… III . ①张岱年 (1909 ~ 2004)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 ① B26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8797 号

书 名	心灵与境界		
著 者	张岱年		
出 品 人	高海浩	责任编辑	赵智熙 周艳玲
总 监 制	徐永新	封面设计	郑金将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64071348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64024637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20 毫米 × 889 毫米 1/16		
字 数	164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1-3502-4	定价 39.80 元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联系电话: 010-84026619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文化通论

- 001 传统文化的反思
- 008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偏倾与活力
- 015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 016 文化体系及其改造
- 027 传统文化的精华
- 031 孔子与中国文化
- 040 孔学平议
- 043 老子学说的宗旨
- 044 儒道之间
- 045 《周易》与传统文化
- 049 《管子》的法教统一观

第二章 哲学旨主

- 054 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 059 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
- 076 中国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学说
- 083 孔子哲学解析
- 098 老子哲学辨微（节选）
- 108 《易传》的生生学说
- 112 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 115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119 哲学的前途

第三章 道德箴言

- 125 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节选）
- 143 生命与道德
- 148 道德之“变”与“常”
- 151 生活理想之四原则
- 160 人伦与独立人格
- 168 生命与人格
- 170 “人的价值”与“自我价值”
- 171 礼义与人心
- 172 中国古代的人学思想
- 183 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

第四章 国学辨微

- 190 漫谈国学
- 191 如何研究国学
- 193 从“孟”、“庄”看学派论争
- 194 学派的消长
- 196 三事与诸子
- 197 述与作
- 199 修辞立其诚
- 201 “以理杀人”与“以理抗势”
- 203 子贡货殖与既富且仁
- 204 疑古与信古
- 206 辨程门立雪
- 208 论诸子的相反相成
- 213 庄惠濠梁之辩
- 214 说觉悟
- 217 谈士节
- 219 评“三不足”
- 221 漫谈正名
- 223 哲苑絮语
- 227 读与思
- 228 爱 智
- 230 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 231 饮食之道

第一章 文化通论

传统文化的反思

近几年来，各种报章杂志上发表了讨论文化问题的文章多篇，真可谓众说纷纭、各抒己见，表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对于许多问题，都还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我认为，这是“争鸣”的正常情况。可能再经过若干年的钻研讨论，对于一些基本问题，会达到一些共同的认识，此时正不必急急做出结论。这里，我就关于传统文化的三个问题再提出一些个人的管见。

这三个问题是：（一）从纪元前到 15 世纪，中国文化经常居于世界的前列，这期间的文化延续发展有没有内在的思想基础？

（二）15 世纪以后，与西方相比，中国落后了，其落后的原因究竟何在？

（三）“五四”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往的传统文

—

上古时代，殷周秦汉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在许多方面都可与西方古希腊罗马相比。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名辩、阴阳，诸子并起，文化学术达到了高度的繁荣。汉代独尊儒术，于是名、墨之学中绝，先秦时代的部分学术失传了，但是科学、文化等仍有进一

步的显著发展。佛教传入以后，中国对于佛教采取了容纳而不屈从的态度，允许佛教的广泛流传，而仍保留儒学的主导地位。隋唐时代，儒、道、佛三教并尊；宋代理学兴起。理学一方面汲取了佛教、道家的一些思想资料，一方面又批判佛、老，从而达到了理论思维的更高水平。北宋时代，在哲学、科学、艺术各方面，在当时世界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只是在军事上，由于取消了将帅的主动权，因而不能抗拒游牧民族的入侵。）

从春秋战国到宋代，中国文化虽然经过曲折的过程（由百家争鸣而独尊儒术，由三教并尊到理学兴起），但总的说来还是不断发展的。这期间的文化发展有无内在的思想基础呢？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我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含有一种奋发向上、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就是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神话没有完整的体系，但具有一个特点，即含有一些人类改造自然的故事，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上射十日”，都是宣扬人有改变自然的能力。后起的盘古传说，讲盘古开天辟地，也与西方上帝创造世界不同。（在传说中，盘古只是一个巨人，并非不死之神。）这些传说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崇拜积极进取的英雄。

儒家虽然提倡“温良恭俭让”，但也宣扬积极进取的精神。孔子自述平生的态度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孔子一生积极活动，致被当时的隐者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同书《宪问》）。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狂者”的可取，而所谓“狂者”是具有“进取”精神的。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同书《子路》）有人认为孔子的积极活动只是为了复古，乃是倒退的活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孔子虽然讲过“吾从周”，但并不认为周制是尽美尽善的，而主张对周制有所损益。他的政治理想是中央集权的“德治”，“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同书《季氏》）。“德治”的观点不

免迂阔，但中央集权的主张却符合时势的要求。要之，孔子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进取”精神的。孔子还称赞“刚毅”，他说：“刚毅木讷近仁。”（同书《子路》）孔子弟子曾子则赞扬“弘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书《泰伯》）孔、曾这种赞扬“刚毅”、“弘毅”的态度，也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观念和“自强不息”的原则。《乾卦·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天行”即日月五星的运行，“乾”是天的本性，天的本性是“刚健”，即运行不已；人应效法天行，勉力向上，决不停息。《需卦·象传》云：“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大有·象传》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如遇险阻，能保持刚健的品德，就可以免于困穷了。“天行健”，是一种主动的宇宙观；“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这些都是精粹思想。两汉以来，传说《周易大传》是孔子所著。到宋代有人怀疑其中的一部分并非孔子的著作。近年来多数哲学史家都认为《易传》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但仍有一些易学专家信持汉代的传说，肯定《易传》是孔子的手笔。总之，在历史上，《易传》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发生影响的。汉代以后，《易》是五经之首，是一般知识分子所必读，因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认为《周易大传》中的“刚健”、“自强不息”的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进取精神的集中表示，也就是古代文化发展的内在思想基础。

儒家强调“贵贱上下”的等级区分，因而受到历代专制君主的尊崇，这是儒家思想的保守方面。但是儒家反对“苛政”、“暴政”，反对君主“言莫予违”的个人独裁。自汉代以来，知识分子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这是在儒学的“刚健”、“自

强不息”的进步观念影响之下形成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曲折过程之中，时治时乱，时分时合，时盛时衰，时进时退，但始终保持着民族的独立性，这不能不说是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有一定的联系。

二

15世纪以后，西方走出了“中世纪”，进入资产阶级文明的近代，而中国还在原地踏步。到了19世纪40年代，发生了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遭遇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人士努力寻求“救亡图强”的道路，而顽固派依然盲目守旧。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直到今日，“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尚有待于完成。

中国近代严重落后的原因何在？

很多论者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儒学。我认为，儒学有消极保守的方面，确实与中国近代迟迟不进具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儒学也有积极进步的方面。所以，把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儒学，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儒学有哪些消极方面呢？除了维护君权、强调贵贱等级之外，儒学缺乏对于形式逻辑的研究，又不重视自然知识，因而不能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此外，儒学更重农轻商，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这还不是中国落后的主因。

我认为，中国近代迟迟不进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儒学，而在于明清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明代初年，废除了宰相，将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个人，其后又实行廷杖制，对于直言敢谏的朝臣横加笞责。对于文化学术采取了高压政策，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借以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到了清代，虽然废除了廷杖制，却大兴文字狱，对于学术思想的压制，更是变本加厉。在这种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压之下，自由思想难以萌发，文化发展的生机枯萎了！

历史经验证明：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是扼制文化发展的严重阻力。西方近代文化的蓬勃发展，正是以思想自由为主要契机的。

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新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最重要的关键是消除文化专制主义的任何遗留和影响，这也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的贯彻执行。

三

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可否认，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 50 年代的多次运动，终于在 60 年代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破四旧”，其结果却是旧社会的一些野蛮现象沉渣泛起，酿成了文化的大倒退。1978 年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文化学术出现了新的曙光。在经济改革大步前进的同时，社会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正之风，思想界发生了“信仰危机”，反传统的思想也弥漫一时。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行进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

我认为，文化的内容包含不同的层次，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高层文化，即学术思想，包含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二是底层文化，即社会心理，包含大多数人的通俗观念、愿望以及潜意识等等。中国传统的高层文化的核心即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的底层文化即是世俗的价值观与二千年来小农经济所养成的风俗习惯。在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与社会中一般人的意识，既互相影响，又有很大的区别，二者往往有很大的距离。例如，儒家宣扬“安贫乐道”，道家更是唾弃富贵利禄，而一般人所追求的还是“富贵荣华”、升官发财。晋代隐士鲁褒写了一篇《钱神论》，描述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富者荣

贵，贫者贱辱。……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常，其源不匮，无还不往，无深不至。……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此文讥刺当时社会上的拜金主义，可谓痛快淋漓。此文写作于西晋时代，也适合于其前其后的社会情况。哲学家虽然不断发出“正其谊不谋其利”的理论号召，社会上多数人还是追求物质财富的。而亦由于哲学家“重义轻利”，很少人对于社会财富问题进行理论的探索，因而一般人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仅仅停留在庸俗见解的水平上。

儒家学说在历史上曾居于统治地位，时至今日，古代哲学，不论儒家和道家的，很少人对之感到兴趣了，更很少人对之有比较深切的理解了。哲学上的孔孟老庄、程朱陆王，文学上的楚辞汉赋、李杜韩柳，对于一般人来说，都已是非常遥远了。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前年《光明日报》的“学者访问录”上登载了一篇《梁漱溟访问记》，当时梁先生大谈其所赞扬的“孔颜乐处”，但发表出来都写成“苦言乐处”。在一次座谈会上，梁先生急急作了更正，后来报纸上才登出正式刊误。当时的记者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我认为把“孔颜乐处”误写为“苦言乐处”具有典型的意义。如果一个名记者还不晓得所谓“孔颜乐处”的典故，那么，社会上有多少人理解所谓“孔颜乐处”呢？这就证明，古代哲学距离现在已经十分遥远了！

近年以来，各种报章杂志上，有许多文章对于儒家“重义轻利”、“存理去欲”进行谴责、批判，认为是对于“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事实上，在今日的时代，究竟还有多少人赞同“重义轻利”、“存理去欲”呢？中国近代社会迟滞不进，是否儒家的“义利”、“理欲”学说的影响所致呢？在儒家学派中，孟子、董仲舒、程朱、陆王是宣扬“重义轻利”的，程朱与王守仁更鼓吹“存理去欲”，但是也有主张义利统一的

思想家，如陈亮、叶适、颜元、李塨，戴震更强调理欲的统一。不能说儒家都是宣扬“重义轻利”、“存理去欲”的。事实上，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见利忘义”、“损公肥私”的行为和现象屡见不鲜，这才是应受谴责的不正之风。

我认为，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中，古代的哲学思想，现在虽然还有人在研究、解释，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具有实际影响的，是从古以来的社会心理。尊官贵长、追求财利，自古已然，于今为烈。50年代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曾经取得良好的效应；“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不正之风却蔓延起来。鲁褒的《钱神论》撰写于西晋时代，却仍可以在今日社会生活中找到其影子。

然而时代的进步也还是明显的。辛亥革命取消了君主专制；五四运动进一步批判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机关里的家长作风、社会上“官本位”的现象以及重男轻女的习俗仍然相当严重，宗教迷信亦有死灰复燃之势。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下的移风易俗，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传统的社会心理中亦有积极的方面。在历史上，每次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虽然有甘为内奸的投降派，但是广大人民还是同仇敌忾，坚决起来进行反侵略的斗争。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广大人民更是投入了救亡图存的英勇搏斗。自秦汉到明清，中国人民虽然长期呻吟于专制君权的压迫之下，但是忍耐也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暴政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人民是坚决起来进行反抗的。应该承认，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中，还存在着反侵略、反暴虐的抗争意识，也就是自重、自强的反奴役意识。

广大人民的反侵略、反暴虐的抗争意识，与学者知识分子的“自强不息”的思想观念是相互一致的，这正是中华民族虽然遭受灾难而仍然保持独立的思想基础。

今天是中华民族文化继往开来的转变时期，应该实现新的民族觉醒，既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也要理解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前进动力。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偏倾与活力

—

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之一。在上古时代，中国的先秦文化，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印度的古代文化，各自独立发展，各以其辉煌的成就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如果以先秦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相比，中国的老子与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同为辩证法的创始人。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与苏格拉底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中国缺乏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的严密的几何学体系，但是在代数学方面具有较大的成就。到两汉时代，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医学渐臻成熟，天文学上的浑天说与西方托勒密天文学的理论可以说互有短长。《内经》中的医疗学说直至今现在仍发挥着治病保健的实际作用。中国古代在哲学、科学、艺术各方面的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众所周知，中国中古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四大发明，其中印刷术到宋代得到较大的发展，火药是北宋时期发明的。约在 14、15 世纪，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罗盘传入西方，对于西方近代文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西方近代许多学者所承认的。中国中古时代的科技发明传到西方以后，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中国本土却没有起这样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西方文化，在 15、16 世纪以后突飞猛进，中国落后了。

中国落后的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明清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及其对于文化学术的高压政策。详言之，明清专制政权对于文化学术所采取的高压政策是中国近代落后的近因；此外还有其远因，其远因主要在于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几次严重的偏倾。（当然，在社会生活中，经济是最基本的，文化发展的迟速，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条件。中国长期没有从自然经济中走出来是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这里姑且从政治和文化本身立论。）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名辩、阴阳诸家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呈现出文化学术全面发展的盛况。到了秦汉以后的中古时代，文化学术出现了几次偏斜现象。第一次偏斜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第二次偏斜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次偏斜是明清两代采取了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从而遏制了文化学术自由发展的机运。

二

秦始皇运用法家的政策，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在统一六国之后，仍尊奉法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著《吕氏春秋》，实际上是向秦王提供一个治国方案。《吕氏春秋》的主要内容是主张兼取儒、墨、道、法诸子之长，不拘一家。可惜秦始皇拒绝了吕不韦的方案，专门信从申韩的学说，李斯更建议“焚书坑儒”，于是诸子之学顿时归于沉寂。幸而秦朝的统治为时不久，迅速被农民革命推翻了。汉代初年，纠正了秦朝的偏失，“除挟书之令”，“置写书之官”，诸子学术又有人研究了。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

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里将“法制”与学术混为一谈，法制确应“持一统”，但是学术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乃是文化发展的正常现象。董仲舒为了政治上“大一统”，建议罢黜百家，“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百家争鸣”的盛况消歇了。

汉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曾献所作《内篇》，即《淮南子》。《淮南子》比较尊崇道家，而强调百家各有所长。《淮南子》说：“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齐俗训》）刘安献书，也是向汉武帝提供一个治国方案，但未被汉武帝所采纳。

汉代中期以后，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但道家之学仍流传不绝。墨、名、法、阴阳诸家，情况各异。墨、名之学基本中绝了。董仲舒的“天意”来自墨子的“天志”，但墨家的科学知识无人继承了。惠施的“历物”学说的详细内容更是失传了。董仲舒汲取了法家的有关刑律的思想，却不重视法家的“法不阿贵”观点；同时汲取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观念，却不接受他的“大九洲”说。如果作数量的统计，可以说先秦诸子的学术有一半失传了。

汉代的天文学、医学有较大的发展，汉代的哲学思想，较之战国时代，却陷于偏枯了。

名墨的消亡，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严重的消极影响。惠子的“遍为万物说”，墨家关于逻辑学、几何学、物理学的理论，俱无传人。中国古代科学虽然仍不断发展，却被认为是“方技”、“方术”，不属于学者的本务了。

清代末年，薛福成曾认为基督教就是墨学，王闿运曾认为西学同于墨学。墨学确与西方学术有类似之处。这也表明，中西学术本非迥异。名墨消亡之后，中西学术的距离拉大了。